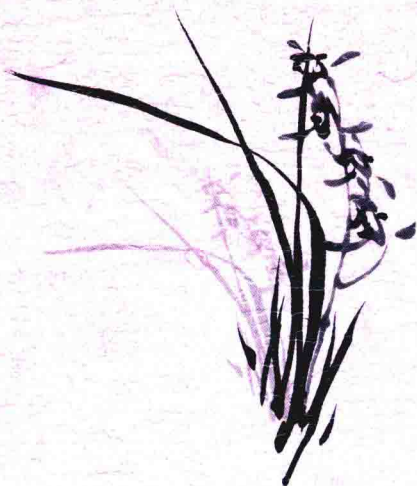


宋代文学评论

SONG DAI WEN XUE PING LUN

(第二辑)

朱 刚 侯体健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代文学评论

SONG DAI WEN XUE PING LUN

(第二辑)

笔记研究专辑

朱 刚 侯体健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文学评论. 第二辑, 笔记研究专辑/朱刚, 侯体健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203-0133-6

I. ①宋… II. ①朱…②侯…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宋代—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445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王佳玉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292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言 笔记作为新兴的写作体制

复旦大学中文系 朱 刚

以《全宋笔记》的编纂出版为标志，对宋代笔记的整理和研究，近年颇有隆兴之势，而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以此为题的也越来越多。仅就笔者掌握的情况来看，21世纪以降的这些学位论文，多数出自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如安苕璇《宋人笔记研究——以随笔杂记为中心》（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5年），郑继猛《宋代都市笔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苗永姝《北宋笔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10年），翟璐《宋代笔记中的苏轼》（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13年），李银珍《宋代笔记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4年），周靖静《北宋笔记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4年），等等^①。这说明，尽管笔记经常被看作“史料”的一种，但实际上至少就宋代笔记的研读而言，宋代文学的研究者显示了比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更大的热情。

由于“笔记小说”这一观念的存在^②，许多笔记可以被视为“小说”，从而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但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所体现的对于宋代笔记的研究热情，并不来自把笔记视为“小说”的

^① 语言学方面的有许秋华《九部宋人笔记称谓词语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3年；凌宏惠《宋代笔记语音资料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学，2014年；音乐史方面的有曾美月《宋代笔记音乐文献史料价值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音乐学院，2009年；文献学方面的有孙励《宋代笔记分类考辨》，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4年；中国史方面的有路玉丽《宋代笔记的研究——以两宋之际的史事为对象》，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11年；王梅《宋代笔记所述党争及其士风》，硕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

^② 参见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

观念，它们中的大部分并没有把笔记视为“文言小说”，至少不仅仅视其为“文言小说”。当然，笔记有大量的内容涉及文人、文学，其作为文学史的“史料”而受到重视，也不妨说是自然的。不过，毫无疑问，笔记也有大量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科技等方面，但这些专门史的研究者，倾向于把笔记看作补充性的史料，与其他史料结合起来论述问题，很少如文学史的研究者那样把笔记当作专门的研究对象。

所以，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在宋代急剧兴盛起来的“笔记”这样一种写作体制，吸引了新生代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一个时代的作者所热衷使用的表达方式、写作体制，自然应该成为文学史的关注对象，就如传统上早已被纳入关注视野的诗、词、古文等体制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记具有了接近于一种文学体裁的意义。兹事体大，我们必须加以探讨。

一般来说，文学史的研究者面对宋人的全部笔记时，最直观的看法也还是“史料”，就是把笔记看作记录的载体，考察其中所记录的与文学相关的内容，如文学作品、文学批评、作家传记资料以及其他各种文坛信息。应该说，所有时代的笔记都具备这一记录功能，但并不抹杀研究宋代笔记的特殊意义。笔记的写作虽不开始于宋代，数量上却是急剧的增长期，这就意味着，在印刷出版的兴盛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笔记的大量写作和快速传播，为其所记录的信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及时性”：及时地记录、及时地传播，从而也有可能及时地获得反馈。可以相信，无论就作者还是读者而言，对于此种“及时性”的意识，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写作、阅读态度，从而造成宋代笔记的内容在整体面貌上与前代的差异。作为写作体制，笔记容易被指责的随意性，使它比成文的各体文章显得地位卑下，但它作为记录载体比别的载体远为轻便的优越性，随着出版业的发展而获得充分的展现，以至于像朱熹那样的大儒，要宣传北宋的“名臣”事迹时，编订的也是笔记体的《八朝名臣言行录》。他没有把收集到的材料剪裁为成文的传记，恰恰相反，他把许多已经成文的墓志、神道碑、传记等拆成了一条一条笔记体的文字。这位大儒终生都未表现出对于随意性的偏好，无论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出于对传播环境的清晰意识，还是仅仅在当时的风气中受到无意识的感染，在相当严肃的著作中颠覆体裁尊卑秩序的

做法依然让人感到意味深长。

或许有鉴于此，在把笔记当作记录载体之外，有的研究者也尝试了另一种研究视角，就是把笔记看作新兴的，或者说从宋代开始被各阶层的作者们广泛地采用的写作体制。这就意味着，笔记将直接被看作文学研究的对象，换言之，就是文学“作品”或“作品集”。必须注意的是，从写作体制的角度将全部笔记体的作品纳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与挑选一部分作品视为“小说”或“小品文”进行研究，立场是完全不同的。

在这方面，有必要介绍一位英国留学生安达（Edward Allen）的工作，他的硕士学位论文《宋元之际文坛中的周密及其文学》^①，显示了他对笔记这一“文体”的思考：他首先为宋元以下中国文人所作笔记的数量之多感到惊异，认定这种“文体”从某个时候起，对于中国文人的自我表达来说，已经成为与诗、词、古文可以并列的体制之一。于是，为了比较说明，他试图在欧洲的写作传统中找到一种可以与中国的笔记相对应的表达体制，结果发现，把这种片段式的杂记编订成书的做法，在欧洲的写作史上虽也偶有出现，却远未成为习惯，更未从“外向”的“记录”发展为“内向”的从而各具个性的“自我表达”。这样一来，在比较的视野里，笔记的写作便呈现为自具特色的中国“传统”。当然，中国的笔记也从“外向”的“记录”起步，至于它何时具备了与诗、词相似的“自我表达”功能，安达找到的关键点是周密，时处晚宋的这位作者显然对笔记倾注了不亚于诗、词的热情，在他那里，作为“自我表达”的体制之一，笔记的意义与诗、词可以等量齐观。按目前对于宋代笔记整体发展进程的把握程度，我们还无法判断以周密为这个关键点是否准确，但安达的工作足以对我们有所启示。笔记，作为传统中国文人最乐于采用的表达方式、写作体制之一，实在不该被驱逐在我们的文学史之外。

这当然关涉一个过于复杂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文字可以被视为“文学”作品。在这个问题上，尊重本国史实的“中国”立场，与尊重领域标准的“文学”立场必然会有所冲突，需要善于融合，才能为“中国文学

^① 安达：《宋元之际文坛中的周密及其文学》，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4年。

史”的研治对象划出合适的边界。然而，这个边界也必然随每代人的观念差异而不断变动，事实上总体的倾向是向外拓展。显而易见，拓展带来的结果主要是积极的，当我们把笔记纳入文学史的考察范围时，文学研究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就可以施诸笔记研究，比如对文学作品的作者、题材、艺术手法的考察，便可移用为对笔记的作者、话题、辞章的考察。这并不表示我们看不到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笔记确实包含了大量毫无“文学性”的条目，如纯粹的记录、考辨、杂谈等。但是，它们与具有高度“文学性”的条目呈现了相同的“文体”，甚至被并置在同一部笔记内，则区划边界的时候，就不宜对它们考虑过多。换句话说，就算不能把每一条笔记都看作文学“作品”，也并不妨碍我们视一部笔记为“作品集”。

在汉语里，“笔记”这个词作为名称，可以指一条笔记，也可以指由许多条笔记汇集而成的一本书。就此而言，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书称为“笔记集”。然而，在传统的书目中，这些书大抵并非“集部”文献。所以，把笔记视为“作品集”的看法，意味着某种观念上的改变。因为我们一旦从“集”的角度去看，笔记经常被指责的内容上的散漫性便属正常现象，正如我们从不期待一部诗集所包含的各篇之间必须具有联系。那么，完全可以用文学研究者所熟知的考察诗集的方法来考察笔记。作者研究、专书研究、文献研究以及人物形象、题材体制等方面的研究，都可以逐步展开。

为此，我们第二届宋代文学同人研修会于2015年4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举办了“文学视野下的宋代笔记研究”专题会议，合力探讨，形成了目前的论集，另有刘宁《〈六一诗话〉与〈本事诗〉的比较研究》一文因故未能收入本辑。这些成果大抵可以分为四类：笔记文献研究、笔记专书研究，以及笔记中的士人形象建构和笔记题材体裁方面的研究。每一类下面都各自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话题，但总体而言，我们完成的只是一种示例性的考察，可以引其端绪，不能总结陈词。参与的诸君都正在盛年，相关研究的充分展开，犹有待焉。

目 录

导言 笔记作为新兴的写作体制	朱 刚(1)
----------------------	--------

宋代笔记的文学文献研究

和刻本宋代笔记叙录	卞东波 王林知(3)
-----------------	------------

宋元笔记方志等文献所见宋代作家及诗文辑考	曾维刚(43)
----------------------------	---------

稀见史料与王安石后裔考

——兼辨宋代笔记中相关记载之讹	刘成国(55)
-----------------------	---------

《家世旧闻》版本补议

——兼议陆游家世诗数量稀少的原因	张 剑(71)
------------------------	---------

宋末笔记作者罗大经生卒年及罢官考	李小龙(100)
------------------------	----------

宋代笔记与士人的形象建构

宋代笔记的谐谑倾向与士大夫的愉悦写作姿态	周剑之(113)
----------------------------	----------

话题,身份与选择:宋代笔记中的人物形象	赵惠俊(132)
---------------------------	----------

笔记中的传奇:由宋入金的文士施宜生	林 岩(156)
-------------------------	----------

宋代笔记专书的文学史研究

《宋景文公笔记》的字学好尚与文章观念

——兼论唐宋散文发展中的语言革新问题	谢 琰(179)
--------------------------	----------

- 《扞虱新话》与宋代诗学 王林知 卞东波(199)
笔记与诗文评:《爱日斋丛抄》文学史价值发覆 侯体健(212)

宋代笔记的文体研究

- 北宋笔记的“话题”研究 朱 刚(229)
百代之中:宋代行记的文体自觉与定型 成 玮(237)
楼钥《北行日记》的文体、空间与记忆 李 贵(253)
大数据视阈中的文学地理学研究
——以《入蜀记》《北行日记》等行录笔记为中心 刘京臣(272)

宋代笔记的文学文献研究

和刻本宋代笔记叙录

南京大学文学院 卞东波 王林知

前言

宋代立国之后，稽古右文，优待士人，文士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文人学士有较多的余暇从事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宋代的士大夫大多同时在政事、学术和文学等领域都有所成就，笔记是他们从政、治学、为文之余，写作的“非文艺散文”（“Nonliterary” prose）^①，但也是宋代士大夫对宋代文化的贡献之一。虽然笔记在创制之初，仍带有“随意性，非正式，能包容单纯的消遣和娱乐”^②的一面，但随着宋代学术的演进，宋代笔记越来越呈现出专业化、学术化的特征。论者认为，以宋代笔记、诗话为代表的“非文艺散文”“比起传统的文学散文来，更能揭示宋代思考写作、思考世界的某些突出特征”^③，可谓一语中的。宋代笔记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远迈之前的唐代。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纂的《全宋笔记》计划出版10辑（目前已经出版7辑），每辑10册，共计100册，每

① “非文艺散文”用的是艾朗诺教授的概括，他在《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五章北宋文学史部分将“个人文集刊落，却见于‘笔记’与‘小说’中的那类散文”称为“非文艺散文”。参见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505页。

② [美]艾朗诺：《新的诗歌批评：诗话的创造》，《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杜斐然、刘鹏、潘玉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70页。

③ 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第五章北宋部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505页。

册收有若干种笔记，故现存的宋代笔记数量多达数百种，而已经亡佚并见于著录的，想必更多。宋代笔记的内容、类型与创作的主体，与宋代的士大夫人格特质密切相关，呈现出非常复杂而多样的景观，有记奇闻轶事者，有评诗品文者，有论经辩史者，有谈佛论老者，有考证名物者，不一而足。不但宋代笔记收录的文献具有极大的学术价值，而且宋代笔记本身也可以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

宋代笔记不但在中国本土留存，而且还在同属东亚汉文化圈的日本得到翻刻和流传，形成所谓的“和刻本宋代笔记”，对古代日本的学术文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刻本宋代笔记”是“和刻本汉籍”中的一种，所谓“和刻本汉籍，正如长泽氏所解释，其形态之多，其种类之复杂，实为可观。有直接翻刻之书，亦有加上日本人注释之书，又有中国原无刻本之汉籍，又有由日本人编纂的中国人文集等等”^①。文中提到的长泽氏，即日本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先生，他是目前对和刻本汉籍整理与研究最深入的学者，先后出版了《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②及《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补正》^③两本和刻本目录书，又主持编印了一系列和刻本汉籍丛书，如《和刻本经书集成》^④《和刻本正史》^⑤《和刻本明清资料集》^⑥《和刻本诸子大成》^⑦《和刻本汉籍随笔集》^⑧《和刻本汉籍文集》^⑨《和刻本汉诗集成》^⑩《和刻本书画集成》^⑪等，包罗经史子集四部。

“笔记”在日本被称为“随笔”，和刻本宋代笔记以收录于长泽规矩也先生所编的《和刻本汉籍随笔集》（共十三集）中的最多，如第二集收录

① [日] 中山步：《“和刻本”的定义及其特点》，《图书馆杂志》2009年第9期。

② [日] 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汲古书院1976年版。

③ [日] 长泽规矩也编：《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补正》，汲古书院1980年版。

④ [日] 长泽规矩也辑：《和刻本经书集成》，汲古书院1975—1977年版。

⑤ [日] 长泽规矩也辑：《和刻本正史》，汲古书院1970—1978年版。

⑥ [日] 长泽规矩也辑：《和刻本明清资料集》，汲古书院1974年版。

⑦ [日] 长泽规矩也辑：《和刻本诸子大成》，汲古书院1975—1976年版。

⑧ [日] 长泽规矩也辑：《和刻本汉籍随笔集》，汲古书院1973—1978年版。

⑨ [日] 长泽规矩也辑：《和刻本汉籍文集》，汲古书院1977—1978年版。

⑩ [日] 长泽规矩也辑：《和刻本汉诗集成》，汲古书院1974—1977年版。

⑪ [日] 长泽规矩也辑：《和刻本书画集成》，汲古书院1975—1977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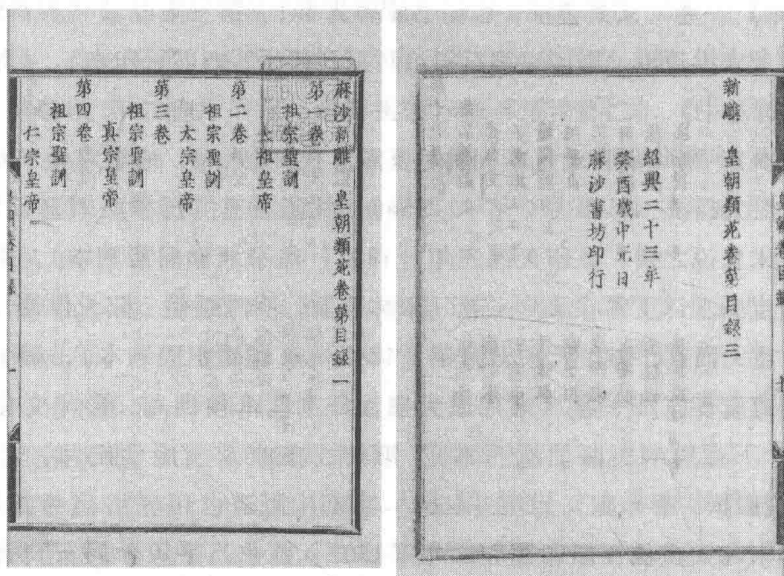
《希通录》一卷（宋萧参撰，影印书簏蟬隼本）、第三集收录《容斋随笔》十六卷（宋洪迈撰，影印京都石田治兵卫刊钱屋惣四郎后印本）、《陈眉公重订野客丛书》十二卷附录一卷（宋王楙撰，影印承应二年〔1653〕中野是谁刊本），第八集收录《新刊鹤林玉露》（天集六卷、地集六卷、人集六卷，宋罗大经撰，影印庆安元年〔1648〕林甚右卫门刊本）、《晁氏客语》一卷（宋晁说之撰，影印天保三年〔1832〕昌平坂学问所刊本），第九集收录《宝颜堂订正省心录》一卷（宋林逋撰，明陈继儒、陈天保校，日本宇津木益夫训点，影印天保十四年〔1843〕京都爱止居刊本），第十辑收录《桂海虞衡志》一卷（宋范成大撰，日本洼木俊训点，影印文化九年〔1812〕下总洼木氏睡仙堂刊本），第十二集收录《困学纪闻》二十卷（宋王应麟撰，影印宽文元年〔1661〕京都中野道也刊本）、《考古质疑》六卷（宋叶大庆撰，影印享和二年〔1802〕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刊官版）、《肯綮录》一卷（宋赵叔向撰，影印文政十二年〔1829〕江户昌平坂学问所刊官版）。但仍有一些宋代笔记，《和刻本汉籍随笔集》未收，如《新雕皇朝类苑》七十八卷（宋江少虞撰，日本元和七年〔1621〕铜活字印本），《吴船录》二卷（宋范成大撰，宽政五年〔1783〕刊本，京都北村四郎兵卫、北村庄介刊），《入蜀记》六卷（宋陆游撰，天明三年〔1794〕刊本，京都博厚堂刊），等等。近年出版的金程宇先生所编的《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①中则收入《新雕皇朝事实类苑》《新刊鹤林玉露》两种和刻本宋代笔记。沈津先生与笔者所编的《日本汉籍图录》^②中则收入上述所有和刻本宋代笔记的书影，可以参看。最近出版的《和刻本四部丛刊》100册^③中也收录了一些和刻本宋代笔记。

从现存的和刻本宋代笔记来看，数量并不多，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首先，有些和刻本宋代笔记保存了宋代原本的面貌，在卷帙上也比中国的传本要完整，最典型的是日本古活字本《新雕皇朝事实类苑》（又称《皇宋事

① 参见金程宇编《和刻本中国古逸书丛刊》第26—31册，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

② 参见沈津、卞东波编著《日本汉籍图录》“子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③ 域外汉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编：《和刻本四部丛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元和七年（1621）古活字本《新雕皇朝类苑》

实类苑》)。江少虞所编的《皇宋事实类苑》成书于绍兴十五年（1145），绍兴二十三年（1153），福建麻沙书坊曾刊刻过此书七十八卷的全本，但此本后在中国失传；中国传本为六十三卷的钞本，后收入《四库全书》中，改名为《事实类苑》。七十八卷本的全本后传入日本，日本元和七年（1621）出版了古活字本的《新雕皇朝事实类苑》，古活字本目录首行题为“麻沙新雕皇朝类苑卷第目录一”，目录第三卷末又有“绍兴二十三年/癸酉岁中元日/麻沙书坊印行”字样，可见日本古活字本是根据宋绍兴麻沙本翻刊的，从古活字本的书名也可以看出是天水旧物。四库馆臣虽对此书评价不甚高，但仍称“北宋一代遗文逸事，略具于斯”，又说其为“说家之总汇”^①。因其载录了数十种宋代文献，特别是其中不少文献今天已经散佚而仅见于该书，则此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如今人所辑的杨亿《杨文公谈苑》大部分取资于该书。而七十八卷的日本古活字本《新雕皇朝事实类苑》无论从存真度，还是完整度上，都是中国六十三卷本无法比拟的。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三“《事实类苑》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61页。

和刻本宋代笔记价值之二在于翻刻本的序跋，从中可以考镜宋代笔记在日本的流传、刊刻情况以及日本学人对其的评论。如文政年间所刻的《容斋随笔》十六卷，卷首有江户时代汉学家赖山阳（1781—1832）《新刊容斋随笔序》云：

洪景庐以忠臣之子，守清要之职，本学兼茂，虽不及庆历、元祐诸公，而不愧为南渡以后名士大夫，其学之博洽，见于《随笔》五编，资后人闻见不鲜云。余尝谓自理学兴，士无肤浅之弊，然久而成窠臼，千言万语尽赴其中，宋元人概然。自考证之学兴，言有凭据，然儒者之业如稽账簿，争较毫厘以取胜，明清人概然。说部本出人人之寤言，宜无二者之弊。而如罗大经之流动堕理语，如杨慎之类徒辄辨证，能脱然于二者之外自盖，盖于人且宏富，取之不竭者，唯景庐及沈括、王楙、顾炎武、王士禛等所笔。……丹波深海伯龟新刊其初编以行于今，二笔以下当陆续上梓。^①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只是《容斋随笔》十六卷在日本得到刊刻，余下的二笔至五笔并未刊成，这也得到了实物的证实。这段文字也可见赖山阳对洪迈的人格以及《容斋随笔》博学都有很高的评价。另外，赖山阳还发表了他对中国笔记整体的意见，指出笔记写作的两种弊端：一种是宋元人的笔记，受到理学的影响，陈词滥调较多；另一种是清人的笔记，受到朴学的影响，专注于细枝末节的考证，这两者都不是笔记的佳作。他比较推重洪迈、沈括、王楙、顾炎武、王士禛等人的笔记，不但学识宏富，而且还能给人以启发。和刻本《容斋随笔》还有另一篇摩岛长弘的《刻容斋随笔叙》：

夫随笔之弊有二：曰蹈袭，曰猥琐。蹈袭者，剽前人之说，左掇右剽，以为己有者也。猥琐者，议论不根乎义理，敷演怪诞不经之

① 《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第三集，汲古书院1973—1978年版，第1—2页。

说，以资人谭笑者也……余读此书盖成于景庐致仕之后，其学已殖，闷中而肆外，晦养而焕发，援据精确，断以正论，无二者之弊，史称考阅典故，渔猎经史，极鬼神事物之变，善非虚称也。况景庐父子兄弟忠节文章萃于一门，映于一代，众心之所钦也。此书岂可不刻乎？随笔之刻于吾邦者，如《鹤林玉露》、《野客丛书》、《辍耕录》、《五杂俎》等，已盛流传。蹈袭如《千百年眼》，猥琐如《麈余》，亦复并行，则此书之出，犹峨眉天都之忽然现于支峰蔓岳之间，则世之文人学士必刮目而见之矣。^①

此叙也指出了笔记写作的另外两种弊端，即蹈袭和猥琐，而《容斋随笔》则无其弊，序者对《容斋随笔》的评价不可谓不高，其原因依旧基于洪迈的学殖深厚以及《容斋随笔》的学术性。文中也简单提到中国笔记在日本流传的情况，上述笔记都已经收入《和刻本汉籍随笔集》中。

再如，宽政五年所刊的陆游《入蜀记》，前有柴野栗山的序云：

欧文忠《于役志》，过于简略而有嫌；郭天锡《客杭日记》，伤于裁截而不畅；王百谷《客越志》，轻薄可恶；冯开之《快雪堂日记》，驳杂可厌；惟放翁《入蜀记》繁简得中，总略有要，其文雅驯而不险，通畅而不俚，风流萧散，无骄傲张杰之气，读之可想见其人与事也，是足以为纪游之法矣。暇日，拔之《知不足斋丛书》中，校而授梓。^②

末有山田汝翼之跋云：

但古人之作虽奇丽如柳柳州，其所纪述不过独阜单流之间，片时只景之赏；山之脉络、水之源委，则皆不可知焉，未足以厌心愉情，涤肠胃而拔胸膏也。顷书肆北村氏示新镌《入蜀记》，其自汴溯江穿峡入蜀，沿道名区胜概，皆留连探赏，必备录而不遗。凭几读之，如身涉其境，

① 《和刻本汉籍随笔集》第三集，汲古书院1973—1978年版，第3—4页。

② 宽政五年刊本《入蜀记》卷首叙，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